第5部分

丝路悠悠：中国历代的陆疆开发——历代边疆开发（上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◆一、农垦：边徼变良田

◆二、畜牧业：草原牧歌唱千年

◆三、道路交通：内通外连的纽带

◆四、经贸往来：互通有无、熙熙攘攘

◆五、文化教育：从蜀郡太守文翁说起

◆六、邮电、工矿业：近代筹边的新“法宝”

驼铃声声，满载着丝绸的商队从长安出发了，正向遥远的欧洲进发。他们穿越了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大小绿洲，那里有无数的中国军民在开荒屯田，为商队提供食宿之便，军队也保护着他们的安全；接着又穿过中亚、西亚的沙漠戈壁，继续前进，前方的人们在等着商队，希望买到东方的丝绸……这就是古老的丝绸之路，不仅促进了中外交流，而且丝绸贸易的进行、丝路的开通与保护、屯田等都促进了古代中国边疆的开发。其实，中国历代在开发边疆方面都有各自的政策和措施，仍值得今天回顾和反思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边疆的区域经济类型、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，经济类型的差异使全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了多样性，而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但不利于边疆的发展，甚至连当地政权机构、驻军的必要开支都难以维持，这自然不利稳固边陲，也不利整个国家的稳定。对此，中国历代王朝、政权的大多数统治者是相当清楚的，尤其是秦汉以后制定了一定的政策，采取过相应的措施，以开发边疆，增强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，从而增强边疆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。近代以后，面对列强的蚕食鲸吞，中国政府不断推出移民实边、实业兴边等政策，制定了相关的计划。这些政策和措施又都成为中国历代治理边疆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在陆疆地区——东北、北部、西北、西部、西南和南部地区，19 世纪中期以前的几千年间，中国的统一王朝往往制定了较为全面的开发政策和措施，边疆的部族政权往往对本地的发展采取了措施。这些政策和措施主要集中在农垦、畜牧、交通、商业和被称为“教化”的文化教育方面，其中农垦又在其中最为突出。鸦片战争以后，民族危机、边疆危机日益加深，朝野上下抵御外侮、保卫边疆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，有意识地开发边疆成为了筹边卫国的重要部分，垦荒兴农、设厂制造、开矿修路、设立学堂都受到人们关注。

一、农垦：边徼变良田

众所周知，除一些少数民族长期以游牧为生外，中国古代的

王朝、政权多以“农”立国，长期强调以“农”为本，在边疆地区也大力推行屯田垦荒政策。1840 年，列强入侵，国土大片丧失，特别是东北、西北边疆领土被沙俄强占后，清政府改变了过去的某些政策，亡羊补牢，积极推行移民实边、开荒耕种政策。

1. 古代的屯田

秦汉以后，无论边疆驻军开展的屯田，还是内地迁到边疆的移民大多以农业为主，这都与以“农”立国的政策有关。大统一的中原王朝，如秦、汉、唐、元、明、清统治时期，都注意让驻军在边疆地区推行屯田，直接的目的是希望解决军粮供应问题，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，在某些地区又起到了开发边疆的重要作用。同时，这些统一王朝还推行移民实边政策，动用中央政府的强大力量，向边疆地区——特别是北部、西北地区大规模移民，既为开发边疆，又力图以此防御边疆的游牧民族，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。史书记载，秦朝向岭南和河套等地区移民实边，汉朝还大规模地在北部、西北边疆推行屯田，唐、元、明、清朝都在边疆大规模地推行了屯田，这已在本书的“边防”部分有所介绍，这里不再赘述。因此，无论是形式上有何不同——明清以前的军屯、民屯，抑或是明清时期出现的商屯、旗屯、遣屯和回屯，还是在直接目的上有何差异，但在当时都收到了保卫边防和开发边疆的双重效果。

不仅大统一时期的王朝重视边疆的农垦，在各政权对峙并立的分裂时期，一些地处边疆的政权也注意发展农业以增强国力，甚至不少辖境较广的分立政权也注意在边疆地区开荒种地，以发展农业、巩固边疆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如战国时期的秦国，在征服蜀地以后设置蜀郡，太守李冰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，不仅解除了岷江泛滥的威胁，而且可灌溉田地三百多万亩，成都平原由此从水患之区变成良田万顷。

三国时期，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征服南中之后，在这一地区设立郡县，派驻军队，同时移民实边、大兴屯田。蜀汉在建宁郡设五部都尉，把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分配给他们做“部曲”，垦荒屯田。李恢担任建宁太守时，还把称为“濮”的少数民族几千人迁到云南、建宁两郡的交界地区，充实边疆。当时，在蜀汉发展农业政策的影响下，云南郡的少数民族出现了分化，仍然从事游牧的称为

“上方夷”，转向农业耕作的被称为“下方夷”。

十六国时期，后赵等一些政权不注意开发边疆，只是在这些地区掠夺人口、财物，甚至把边疆地区的部族迁往易于控制的地区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一些政权更注重发展农业，主要是因为农业为养军提供了粮食保障，是国力增强的基础——在割据对抗的战争中没有军队就难以生存，养军、扩军都需要足够的军粮，只有农业发展了，才能为军队提供长期的物质基础。前秦在当时实力最强，一度短期统一北方，它之所以能迅速发展，与谋士王猛的建议密不可分。357 年，苻坚即位后，重用汉族的谋士王猛，在他的建议下，曾经推行“课农桑”的政策，发展农耕，推广蚕桑。

前燕、北燕、前凉、南凉、代国等政权都地处边疆，也都注意发展农业。前燕、北燕都地处当时中国的东北边疆。慕容皝时期（337 年~348 年），前燕的疆土扩大了，人口激增，但由于土地尚未开发、赋税政策不合理，竟出现人多地狭、无田的占到 40% 左右的情况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他降低赋税，使用官府的牛、耕种官府田地者所缴租税由每年收成的 8 成降为 6 成，有牛、只耕种官田者所纳租税由每年收成的 7 成降为 5 成；把原来贵族们用于打猎的苑囿改为农田，分给没田的农民和无家可归的流民，还无偿把耕牛分给那些极其贫困的流民；疏浚沟渠，兴修水利。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，使东北边疆的经济水平逐渐接近内地，前燕的国力也不断增强，曾派军南进，扩大了辖地。407 年~436 年间的北燕是由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建立的，也注意减轻赋税，鼓励、发展农耕和蚕桑。

代国即北魏，386 年由鲜卑人拓跋珪建立，同年即改国号为“魏”，在建国初期就十分注意发展农业。394 年（北魏登国九年），他派人到黄河北岸组织屯田，在河北五原（今内蒙古包头西）到杨橛塞（今包头东）一带垦荒耕种；398 年（北魏天兴元年），他建都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，并把从后燕掠来的百姓、官吏和高丽、鲜卑等少数民族 36 万人，以及手工业者十多万人迁到这里，给予耕牛，按人口分田，实行大规模的屯田。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塞北农业的发展，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，并为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前凉、南凉都位于当时中国的西北边疆。4 世纪初至 376 年，张轨及其子孙相继统治河西走廊——凉州地区，初期仍采用晋朝的年号，317 年后建立了独立的政权，被称为“前凉”。西晋末年，中原大乱，凉州则较为安定，大量的中原官吏、人民前往凉州避难。此时，张轨正担任凉州刺史，他收留了这些内地流寓官民，并把这些人安置下来，设置了武兴、晋兴、广武等郡，他的子孙又相继增设高昌、晋昌等郡，把辖地由凉州发展到了凉州、河州和沙州三个州。接纳外来人口，新设州郡，都需要一定的粮食来养活，所以张氏政权比较注重农业，比如张骏时期（324 年~345 年）曾在一些地区清除了石头，开垦出田地，又从其他地方运土加以充实，虽费力耗时，但也说明当时垦荒拓地的热情和力度。南凉是鲜卑族首领秃发乌孤建立的，在 397 年~414 年间统治着黄河、湟水地区。南凉政权靠自己的统治民族——秃发鲜卑专门从事对外征战，把从青海、河西等地掠来的汉、羌等民族组织起来，在辖区各地发展农业和蚕桑，为军队提供粮食、布匹等物资保障。

2. 近代的垦殖筹边

19 世纪中期，面对列强入侵、国土丧失的危急局势，清政府实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，采取各种措施招募内地人民到边疆开垦荒地、发展生产。晚清时期，在曾经实施封禁政策的东北、蒙古地区，废止了封禁政策，向移民开放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

在东北，1858 年前黑龙江地方军政官员曾两次奏请招民开垦呼兰河地区荒地，均遭清政府拒绝。1858 年至 1860 年，沙俄以不平等条约强占了大片中国领土，这才让清政府猛然清醒，1860 年即开放了“龙兴之地”，首先批准开垦呼兰河平原，1861 年招民开垦吉林西北的荒地，于是东北边疆的移民实边正式开始。在奉天（今辽宁）境内，内地移民对鸭绿江流域进行自发开发，到 1869 年时已达 9.6 万多顷，按当时东北地区 1 顷合约 15 亩计算，已有 15.4 万亩；西北的昌图、洮南等地区，清政府也招人开垦，或认可了移民的自发开发，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，清末设立了辉南直隶厅和昌图府、洮南府。在吉林、黑龙江，“闯关东”的山东、河北移民大量流入，晚清的开发初见成效，但仍有大片土地有待开垦。

在蒙古族分布的北部草原地区，清前期就已开发了河套地区的

一部分，晚清则开放了察哈尔、热河、绥远、外蒙古的大片地区，或招人认垦，或认可自发开垦，使许多地区由草原很快变成了农业区。比如在察哈尔，1902 年~1905 年间在左翼四旗放垦约 2 万顷，在右翼四旗放垦 2.5 万顷；在热河，1906 年开始放垦昭乌达盟西拉木伦河沿岸各旗土地，到 1911 年时已放垦巴林右旗土地 8000 多顷。今天河北、内蒙古交界地区的许多县，如围场、隆化等都是在晚清开垦之中发展起来，并随着人口的增加而设立的。又如在外蒙古地区，1880 年库伦办事大臣开始办理招垦事宜，吸引了大量的内地汉族移民前往，民国初年时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已多达 10 万人，一半为农民，而同一时期的蒙古族居民也不过 54 万人。

除了东北、蒙古地区外，其他地区也推行了移民实边政策，比如在新疆，平定阿古柏叛乱后，地方政府一直举办军屯民屯。在南部边疆，广西方面也采取了这一政策，招民垦荒是其中的重要措施。中法战争后，广西大量裁减了抗法战争时招募的兵勇，三万多人被裁掉，不少人在用掉所发的钱米之后无法回家，一些人本来就无家可归，于是就成了在中越边境地区游荡的“游勇”。广西按察使李秉衡、边防督办苏元春等人认为，如果把“游勇”安置在沿边开垦耕种，不但可以代替数万军队防范法军，而且可开发南疆，稳定社会秩序。广西地方为此划出了沿边的大片未垦荒地，愿意认垦的发给耕牛、种子，在没有收获前仍给予一定的盐、米，并编成保甲加以管理。这一措施出台后，不仅大量“游勇”前来认垦，而且内地的不少人也赶往垦荒。此外，他们还鼓励边防驻军的家属落户边疆，这都使地处沿边的地区迅速发展起来，凭祥、宁明、龙州等地的不少地方成为“烟户相望”的繁荣市镇。

中华民国成立后，向边疆移民、开发边疆长期受到人们关注，边疆地区的地方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。民国初年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就积极主张修建铁路、建设海港和移民边疆，还特别提出要向新疆、蒙古地区移民，以贷款的方式鼓励他们垦荒种地。到抗战时期，鉴于日寇占领东部沿海地区，大量人口内迁，许多人就建议国民政府移民西北地区，开垦荒地、开发边疆，抗战胜利后仍有人建议在边疆组织垦荒，比如 1947 年 5 月有人建议由中央政府拨款，在河套地区设立大规模的集体农场，拨给新式

农具，以期改进农业生产方式，增加粮食生产。

在边疆地区，为开发本地、增加财源，地方政府往往制定了相关措施，鼓励或招募移民开垦荒地。我们就仍以内蒙、东北、西北为例看看吧。在内蒙古地区，民国时期设立了绥远、察哈尔和热河三个省级政区。其中，绥远地区在 1920 年前后移民增多，河套地区吸引了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等省的大量移民，1931 年时已放荒 18 万多顷。察哈尔地区平绥铁路、包绥公路的开通，吸引了大量移民，1915 年~1927 年间垦务总局共放垦 6.6 万多顷。热河的放垦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，并在垦区设立了开鲁、林西两县。1931 年后，受日军侵略等因素的影响，这一地区的不少移民内迁，许多垦区由开发热潮变为冷清，在绥远就约有三分之一的垦地废弃。

在东北，黑龙江省 1914 年制定了《招垦规则》和《清丈规则》，在齐齐哈尔设立清丈兼招垦分局，并把放荒招垦的重点放在沿边地区，把清丈的重点放在已经开垦的呼兰等地区；1921 年，黑河地区官员又推出边疆招垦办法，即特许耕种、宽减赋税、保护治安和厉行奖励的办法，这些都吸引了不少内地人民前来垦荒，多时平均每年有 14 万多人。1928 年，黑龙江省又出台《沿边各属荒地抢垦试办章程》，规定移民可免交三年租税，当年就迁入 43 万多人。吉林、奉天也制定过相关政策，如吉林在 1914 年出台《放荒规则》，奉天在 1925 年制定《垦荒大纲》，吸引了不少内地移民。总体上看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前，三省的垦荒以黑龙江省最见成效，次为吉林。据统计 1912 年~1919 年间从内地向东北的移民多达 177 万人，其中绝大多数留在了黑、吉两省。此外，吉、奉两省还吸纳了一些朝鲜侨民从事农垦。

在西北地区，新疆、宁夏、甘肃、青海等地方政府也设立专门机构，出台了相关政策，但各地进展情况不同。新疆省政府一直积极鼓励移民垦荒，1935 年从陕西至新疆公路开通后才流入了较多的内地移民。宁夏、甘肃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才推出招民垦荒政策，宁夏虽然制定了开荒 1.4 万顷的计划，但未能实施；甘肃的垦荒效果一直不太明显，1933 年后才稍有起色。因粮价波动，青海在 1929 年一度出现认垦高潮，内地移民纷纷前往，而后走向低潮，前往青海认垦者大大减少。

二、畜牧业：草原牧歌唱千年

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，这首传诵千年的《敕勒歌》把一幅如诗如画的草原美景展现在我们眼前，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古老的游牧民族的人们挥舞着长鞭，唱着嘹亮的牧歌，赶着牛羊放牧的场景。在中国的北方，正是这片辽阔的大草原及其北方的大漠，是历史上游牧民族长期活动的大舞台，从鬼方到匈奴、乌桓（丸）、鲜卑、柔然，再到突厥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，诸多的民族都曾经在这里生活，有的建立了强大的政权，甚至让中原地区的王朝、政权心怀畏惧、重兵设防。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，与同一时期的中原王朝、政权一样，都是当时中国境内的政权，其辖地都是当时中国领土的一部分。

由于自然环境和发展历史的不同，北疆的这些民族多以畜牧业为主，过着游牧的生活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开发着中国的北部边疆。即使以强大的武力南下中原，往往很快就退回，或者是被中原地区强大的王朝、政权击退，或者掠夺人口、财物后满载而归。隋唐时期，这些民族的经济文化水平逐步提高，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融合达到新的高度。10 世纪以后，中国境内出现了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并立的状态，进入了辽、夏、金与宋对峙并立的时期，而后又进入蒙古族、满族一统天下的元朝和清朝。即使如此，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北部边疆仍注意发展畜牧业，如辽朝因人制宜、因地制宜，在辖区内实行双轨制，北部少数民族地区仍基本维持原来的生产方式——以游牧为主的畜牧业。

当然，北部大草原上牛羊成群的景象，从清朝前期起逐步被农民开垦耕种的场景代替。清前期，草原上的蒙古各部仍以游牧为业，由于内地移民不断前往垦荒，清初为防止蒙汉结合反抗清朝统治，一再下令禁止内地农民私入蒙地开垦耕种。尽管以后清政府又三令五申，但实际上并未采取强硬措施加以限制，一些政策和措施恰恰起到相反的作用，特别是康熙年间（1662 年~1722 年），由于战事频繁，需要大量军粮，清政府提倡垦荒种田，还让理藩院派官员到蒙古地区进行指导，包括如何垦荒耕种、兴修水利等等，并发放农具、耕牛。部分蒙古和一些地方官员也表现积

极，有的要求中央征发内地汉民前往开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量的河北、山东、山西农民向蒙古族游牧区自发移民，在大草原进行大规模垦殖，黄河北岸的草原逐步变成了农业区，晚清和民国时期（1840 年~1949 年）更多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，游牧民族嘹亮的歌声逐渐远去了。

三、道路交通：内通外连的纽带

边疆与内地人民之间的往来离不开道路交通，中原王朝、政权与边疆民族之间、边疆民族政权之间的联系也不可能离开道路。尽管我国古代就有“嫦娥奔月”和“夸父逐日”的传说，还有人进行过早期的航空、航天试验，但这只能反映古代中国在空中旅行的梦想和实践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坐着飞机几个小时内就从内地到达边疆。在古代中国，驿路、官路等道路仍是边疆地区、边疆与内地往来的主要途径，又以陆路为主，有江河湖泊的地区当然还有水路。近代以后，公路、铁路、轮船运输和航空运输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，在边疆地区也得到发展，与古代的驿路一样，成为内通外连的纽带。

1. 先秦时期：“石牛粪金”的传说

在传说时代我们的祖先们披荆斩棘，已经开辟出道路，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、炎帝大战，还是大禹在涂山大会“万国”，都需要相关各方的首领、军队或使者赶往会战或会盟的地点，道路自然随之出现，即使“本没有路，只是走的人多了，也就成了路”。商周时代，殷商的国都一再迁移，商王、周王经常征伐边疆方国或部族，西周初期受封的诸侯也要千里迢迢地赶到受封地，春秋战国时期齐、燕、秦等诸侯之间、华夏族诸侯国与夷蛮狄戎之间的战争不断。正是在这些活动中，逐步形成了中心区域到边疆的道路、边疆地区内部的道路。

到战国末期，边疆地区的道路有了一定发展。在北部边疆，秦、赵、燕三国的长城都设有关塞，如赵国设高阙塞（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境内）和挺关（今陕西榆林市境内），燕国有令疵塞（今河北迁安县西）、居庸塞（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北的居庸关），这些关塞都

有道路与国内的都邑相通。在西南地区，楚将庄跻率军入滇，开辟了从今重庆涪陵经贵州西部到达滇池的道路，秦军攻蜀开辟了从汉中到成都的“金牛道”。金牛道又叫“石牛道”，从今汉中向西，过褒河，经勉县、宁强两县进入四川广元县，然后沿嘉陵江前行，再经剑门、梓潼、绵阳到成都。关于这条路的开通，还有一个“石牛粪金”的传说，西汉扬雄在《蜀王本纪》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秦惠王时期，蜀王不肯归降，秦国也找不到进攻蜀的道路。有一次，蜀王外出在褒谷（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褒城镇附近）打猎，与秦惠王相遇，惠王送给他一筐金子，蜀王也回赠礼品，而后各自返回。惠王很快就发现礼品都变成了土，于是大怒，而大臣们却向他道喜：“土就象征着土地，秦国应当得到蜀。”惠王早有吞并之心，听后很是高兴，又怕忘了相遇的地点，就下令在这个地方刻了五尊石牛，还让人在牛的后面各放了一堆金子。他们走后，就有蜀人向蜀王报告说，秦国的石牛下的粪都能变成金子。蜀王已经得了秦王的金子，希望得到更多金子，就派一千多士兵，带着许多大力士，把石牛从褒谷拖到都城（今四川成都）。这样，从褒谷到成都的道路就开通了，秦国沿路进军，征服了蜀国。

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，却多少反映了古代蜀地的部族开凿石牛道的影子——动用成百上千的军卒和青壮劳力（大力士），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遇山凿路、遇水架桥，终于把牛一样大的石头一块块除去，开通了成都通往汉中的道路，给偏僻闭塞的蜀地带来金子一样重要的好处。同时，这也说明先秦时代边疆地区的部族也开始开辟了本地区的道路，并与内地的道路逐步连接起来。这与北方的部族开辟南下道路一样，使当时中国边疆与内地的道路逐渐连成一体。当然，北部的匈奴等部族的开路方式有所不同，他们是以滚滚铁骑开通了从大草原到中原的道路。不管开辟道路的初衷是为军事上的进攻、防守，还是和平的联系，在当时都有助于边疆地区自身的联系，有利于边疆与内地的联系，从而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发展。

2. 秦汉至南北朝：边疆地区道路的不断发展

从秦汉至南北朝，中国经历秦汉的统一和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，无论是统一时期的广修道路（甚至强调“车同轨”），还是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分裂政权之间征战不断（“车辚辚，马萧萧”之中道路不断开拓），都使边疆地区的道路有了发展，也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。



秦直道路线示意图 （采自《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》第77页）

秦灭六国后就广修道路，先后兴修了驰道、直道、岭南新道、五尺道，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车轨，一律定为六尺，使中国古代的道路交通网初步形成，并把边疆与内地紧密地联系起来。为连接北部边疆，公元前 212 年起用两年多的时间修筑了直道，南起咸阳以北的林光宫，经今陕西淳化、旬邑、甘泉、安塞等县进入鄂尔多斯草原，直至九原郡（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）。岭南新道是秦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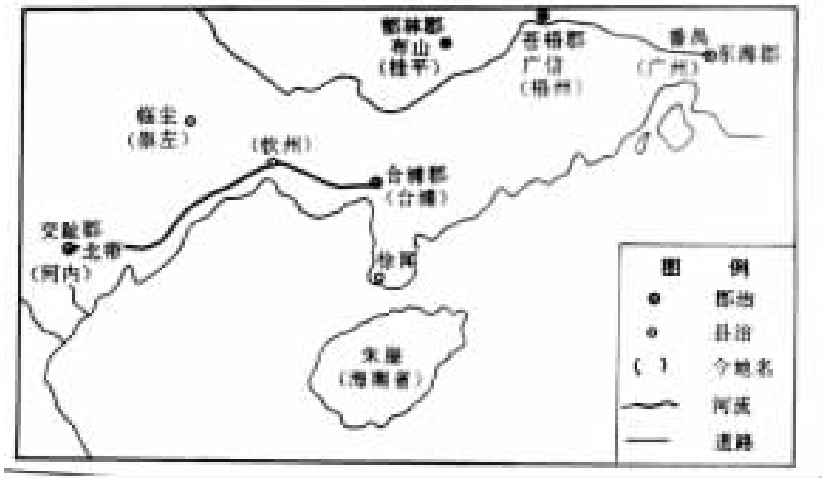
大军穿越五岭时开辟的，水、陆相连，翻越五岭而南下。五尺道是为经略西南边疆而开凿的，早在战国时期就由蜀郡太守李冰——也就是都江堰的修建者主持，开通从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的道路，秦统一后又派将军常頞继续开凿、扩建，在今宜宾到云南昭通的崇山峻岭之间开凿了五尺宽的道路，称为“五尺道”。

秦朝开通这些道路首先带有军事的目的，直道、五尺道等都为便于军队迅速到达边疆而开通，同时又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，而且不少道路长期被使用，比如在直道沿线，今天已发现了秦汉至明清的文物，既有与战争有关的戈矛，又有与经济、文化相关的货币、铜镜和摩崖石刻等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
两汉时期，由于武帝时的开拓，疆土较之秦朝更为广阔，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，道路交通也比秦朝更加网络化。西汉时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道路网，东汉时又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道路网，通向边疆地区的有五原塞道、飞狐道、夜郎道、交趾道等多条道路。其中，五原塞道北通匈奴、南至长安，即从长安向东北，经过今山西境内到达太原郡，而后向北可达雁门、云中、五原等郡，再向北可直达匈奴单于十月祭天的龙城（在今蒙古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西侧和硕柴达木湖附近），因这条道路经过稠阳县城（今内蒙古包头市东），又称为稠阳道。飞狐道则是北疆地区的道路，从涿郡（治今河北涿州市）向西，经故安（今河北易县）至广昌（今河北涞源），而后向北穿过飞狐关至代县（今河北蔚县），再向西经平舒（今山西广灵）折向北直达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。这条道路因经过“太行八径”之一的飞狐关而得名。飞狐关又叫飞狐口，是当时从并州进入冀州的咽喉要地，两侧是悬崖峭壁，十分险峻，只有像狐狸一样灵巧的动物才能飞越而过，所以命名为“飞狐口”。此外，从长安或洛阳通向东北的道路，经过右北平郡（治今河北丰润县）达辽西、辽东，再前往玄菟（治今辽宁新宾县西）、乐浪（治所今朝鲜平壤）等地。

在西南、南部地区，两汉时期新开了多条道路。夜郎道、灵关道都在西南地区，前者是在夜郎内附后开通的，从犍为郡（治所今四川宜宾）向南经过今贵州威宁、毕节至关岭，再向东北到夜郎都尉（治所今贵州安顺）、牂柯郡（治所今贵州福泉）；后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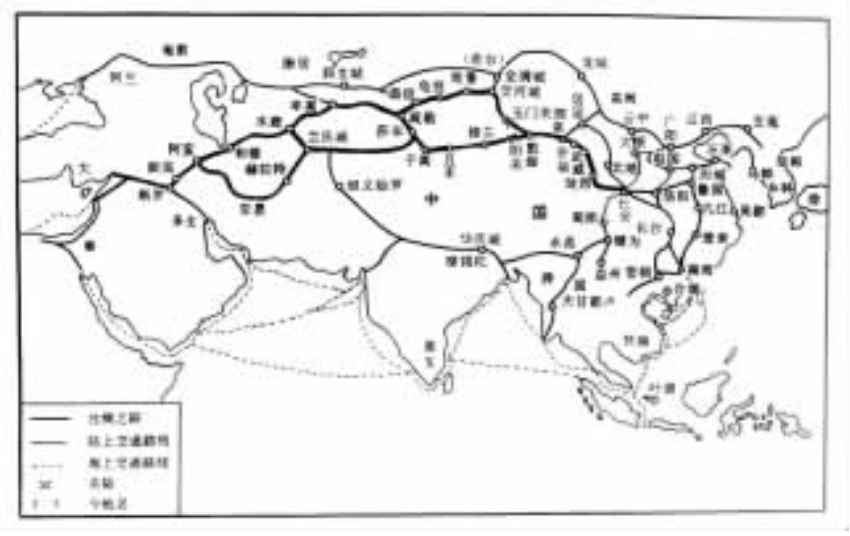
又称为灵光道、旄牛道，从犍为郡向西南至旄牛（今四川汉源县），再向南至越巂郡（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境内），从而打通成都与永昌郡（治所今云南保山市）和益州郡（治所今云南晋宁县）的道路，把西南边疆连接起来。在南部，东汉时马援南征交趾，从合浦（今广西合浦东北）沿海岸开山通路千余里，直达交趾郡（治今越南河内东北），这条道路被称为“交趾道”，是内地通往南疆的重要道路。



交趾道示意图 （采自《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》第98页）

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两汉道路交通发展的重要事件，也成为此后对中国西北边疆和中外关系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。这条中外闻名的道路在汉代称为通西域道，西汉时从长安出发，东汉时以洛阳为起点，向西经过西域地区通向中亚、西亚、南亚和欧洲，又可分为东、中、西三段。东段从长安或洛阳出发到武威郡，再沿河西走廊，或穿越腾格里沙漠，抑或沿祁连山脉南麓西进，再经张掖郡、酒泉郡至敦煌郡。中段从敦煌郡出玉门关、阳关西行，进入今新疆境内。西段分为南、北两条线路，南线从阳关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楼兰（今新疆鄯善县境内）、扜泥（今新疆若羌县），再沿昆仑山北麓西行，经过今且末、和田、莎车等县境内，翻越葱岭（今帕米尔高原），前往中亚的大月氏或安息；北线从玉门关西行，沿天

山南麓，经过今新疆库尔勒、库车、阿克苏、喀什等县市境内，越过葱岭，前往大宛、康居等国，因为经过北道向内地输入貂皮等商品，所以又称为“皮毛之路”。



汉代中外交通示意图 （采自《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》第104页）
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境内处于分裂状态，边疆地区的不少政权在辖区也注意发展交通，如东北边疆的前燕，经过多年的经营，形成了以黄龙城（今辽宁朝阳市）为中心的道路网，东经今辽阳、通化到丸都（今吉林集安），西经今辽宁凌源和河北平泉、承德到幽州（今北京市西南），南经今辽宁绥中入山海关，北经今内蒙古敖汉旗到临潢（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）。又如西北地区，各政权与内地联系的道路也有多条，如河西路、青海路等。其中，河西路东起长安，经过秦陇、河西走廊到玉门关，而后向西延伸，南至鄯善，北越沙漠到车师。青海路的西线经西宁，沿青海湖北岸，穿过柴达木盆地，而后接丝绸之路南线前往西域、中亚；东线则向东南经今四川松潘到成都，与当时东晋的道路相连。

北魏时期，先后以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、洛阳为都城，邺城、长安又是重要的商业城市，中国北部形成了以平城、洛阳、长安

为中心的道路网。其中，一些道路联系着边疆与内地，比如平城与北边六镇之间的道路，从平城向西至盛乐（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），而后分道连接武川、抚冥、怀朔、沃野四镇；向东北经今山西阳高、河北张家口境内，再分道连接柔玄、怀荒两镇。

3. 隋唐时期：边疆地区道路的初步网络化

隋唐时期，国家统一，疆土扩大，经济繁荣，边疆地区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，边疆地区初步形成了以幽州、太原、凉州、成都、广州等城市为中心的道路网络，与内地的联系比以前更加紧密。

幽州以蓟县（今北京市）为治所，是隋唐时期控制东北地区的政治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，是统辖北方、奚、契丹、室韦、靺鞨等民族的军事重镇，唐朝还设了幽州节度、经略、镇守大使。幽州有道路内连长安、洛阳，向西经今河北、山西境内直到太原；向北经今北京市怀柔、密云境内，出古北口，再向北可直达奚族首领的牙帐（今内蒙古宁城县西）；向西北出今北京市昌平区内的居庸关，经今河北的怀来、赤城到临潢府（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）；向东北，经潞县（今北京市通州区东）、三河（今河北三河县西）至蓟州（治今天津蓟县），而后经今河北玉田、丰润、卢龙等县境内，出临榆关（今河北丰润县东）前往营州（治今辽宁朝阳市），或者过今河北遵化市境内、出喜峰口经大城子（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）到营州。

太原是隋唐时期北方的重镇，又是李渊起兵之地，是唐朝的北京。太原与长安、洛阳都有道路相通，又经今山西晋中市东行，出井陉关前往幽州；经今山西阳曲县出石岭关，向北经忻州市至代州（治所雁门，今山西代县），而后从雁门向北，经云州（治所今山西大同市）、静边军（今山西右玉县）前往单于都护府（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），这是长安到单于都护府的主干道。

凉州（治所今甘肃武威市）则是西北的重镇，与长安有南北两条道路相连。南线从长安经今陕西的兴平、岐山、陇县和甘肃的清水、陇西、渭源等县境内到兰州（治所今甘肃兰州），接着向西经平番（今甘肃永登）到凉州；北线从长安出发，经今陕西的礼泉、乾县、长武和甘肃的泾川、平凉和宁夏的固原等县市境内，再经甘肃的靖西、景泰等县境内到达凉州。凉州又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，

沿着河西走廊向西北前行，出嘉峪关（在今甘肃嘉峪关市内）经瓜州（今甘肃安西县）、沙州（今甘肃敦煌市）到西域。从长安经凉州至西域，这条路线又成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。

成都是隋唐时期西南的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又是唐代剑南节度使的驻地，安史之乱时唐玄宗等在此避难，就把它升格为南京。从长安到成都的道路主要是驿路，在唐代比较发达，因为要翻越秦岭山脉，所以秦岭的交通较为发达。成都是西南的交通枢纽，对于唐王朝与吐蕃、南诏等的往来关系重大，所以既有道路连接长安和内地，又有道路通向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。从成都向北经过今四川彭州、汶川、理县等县市境内，即可到达当时的吐蕃辖区；若再由今汶川北上，经今茂县、松潘等县，就可前往吐谷浑的分布区。从成都向西南，经今四川邛崃、名山、雅安等县市，再向西南就可到达南诏辖区。

在唐代的西南地区，还有一条通向长安的“天宝荔枝道”是值得一提的。天宝年间（742 年~755 年），唐玄宗沉迷于声色之中，极其宠爱杨贵妃，很喜欢吃涪州（今重庆市涪陵区）的新鲜荔枝，为此要求当地作为贡品送到长安。为保持荔枝的新鲜和口感，专门开辟了一条驿道，从涪州经今重庆市的垫江、梁平和四川的开江、宣汉等县境内，而后越过巴山入汉中，再越秦岭直到长安。在这条道路上，各驿站的驿卒们疲于奔命，把荔枝一站接一站地送到长安。沿途的人们看到驿路上烟尘滚滚，还以为他们在传送紧急公文，哪里知道他们在传递荔枝，哪里又知道他们的辛苦换来的只是贵妃娘娘的妩媚一笑！于是，后来有人写诗称：“红尘一骑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。当然，安禄山起兵反唐后，唐玄宗又仓皇逃往四川，此时绝不是为荔枝而来，而是为保命，而且身边也少了曾经一起吃荔枝的杨贵妃。

隋唐时期，随着中外交往的加深，不仅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出勃勃生机，成为当时中国与中亚、西亚等地区联系的纽带，而且还开辟新的国际交通线路。这些新的线路又都途经当时中国的边疆地区，从而促进了边疆地区与境外的交往，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发展。中国、尼泊尔国际通道的开通就是其中之一。西南边疆地区的吐蕃与唐王朝往来密切，特别是使者往来和文成公主出嫁，开辟了被称为“唐蕃古道”的交通大道。这条道路从长安出发，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